

從血腥的國旗看到『二二八』

— 一個『二二八』遺屬的心聲 —

王克雄

一九四七年三月的一個下午，從台北往南港的路上，有一婦人撐著紙雨傘慢慢地走著。那是一個下著細雨，冷風吹拂的陰天。路上沒有多少行人，只見這婦人逢人就問：“先生，請問叨位有人看到屍體？”大家都說不知道。終於問到一位擔著一對籃子賣菜的老人家。他說：“妳往前走約十五分鐘，在溪邊有些人聚集的所在就是。”

到了那兒，有五、六人遠遠圍觀，在橋邊有八具屍體，那都是被中國國民黨軍隊所殺害的。有的被刺刀所殺，有的被槍彈所殺，屍體及地上都是血，實在慘不忍睹。這婦人看了這情景大哭出聲來，把傘丟下，跑上前去，一個又一個屍體仔細察看，卻都不是她的丈夫。

在那漫長的回程上，這婦人感到心疲力竭，因為又奔波了一天沒找到丈夫的屍體；但另一方面卻有一絲希望湧了出來，也許丈夫沒被殺，不久會回來。路上有些中國國民黨軍隊在檢查來往的行人及車輛，他們布帽子上有著青底白日的小徽章，路邊有一輛軍用十輪大卡車，車上飄著一面中華民國的國旗。看到軍人這婦人趕緊擦乾眼淚，但看到那面鮮紅的國旗就禁不住想起那些全身血跡的屍體，身體不由顫抖起來。以上是描述當年我母親一聽到有屍體出現，就迫不及待地尋求她日夜思念的丈夫的情形。

我的父親王育霖檢察官，日本東京大學法學院畢業，成績非常好，在大學三年級就已司法官高等考試及格。他受到東京大學法學院院長特別推薦，成為第一位在日本當檢察官的台灣人，且被分派在京都任職。因為檢察官在大戰期間有指揮警察等職權，所以日本人很不願意讓台灣人擔任檢察官。我父親非常熱愛台灣，在台北高等學校讀書時，就寫“台灣歌謠考”，長達十三頁，來探討台灣歌謠的歷史變遷、分類及表達方式。大戰期間，在日本京都特別照顧台灣的留學生。戰後，更擔任台灣同鄉會會長，在動亂中照顧台灣同胞的生活及安排回台灣的船票。

大戰結束，我們就回到台灣，我父親在新竹地方法院任檢察官一職。他辦案勇於負責，無枉無縱，不懼權勢，不為利誘。在新竹任內辦了很多大案件，有走私、貪污、謀殺等。最後一宗聯合國救濟奶粉貪污案件，因為牽涉新竹市市長郭紹宗陸軍少將，沒人願意接辦。我父親不願見到貪官污吏逍遙法外，毅然承擔下來，並積極查訪證人，收集證據。不料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終被迫辭職。暫時在台北建國中學教書，任林茂生先生辦「民報」的法律顧問，並申請律師執照。當時他並沒有參與二二八事件的活動，卻在一九四七年三月十四日遭中國國民黨的軍隊押走，而一直沒有消息。那時我父親二十九歲，母親二十六歲，我才二歲九個月，而我的弟弟才三個月大。國民黨不但殺了人，卻不把屍體發還喪家埋葬，

這是極端不人道的。

二二八事件時，台灣各地都有人被中國國民黨軍隊殺死，其中以基隆、台北、嘉義、高雄及屏東最為嚴重。除了在路上瘋狂殺人外，更有計畫地逮捕台灣的領導及知識分子，被殺的有法官、檢察官、律師、國大代表、市參議員、醫師、大學教授、中學教員等等。到底有多少台灣人被殺害？國民黨的保安處估計六千二百多人，美國駐台北大使館的柯喬治先生估計有二萬多人，另有人說高達十幾萬人，一般來說有三萬的台灣人被殺。在那時六百萬台灣同胞中，約每二百人就有一人被殺害，把一個美麗的寶島變成到處鮮血橫流，哀聲遍地，充滿恐懼的災難地。這是蔣介石及陳儀用無情的屠殺來教訓台灣人，以便鞏固他們的殘暴政權。

中華民國國旗的左上方，我們看到那「青天白日」，這原是中國國民黨的黨旗。剩下的「滿地紅」則是二二八事件時，台灣人在全島各地所流的鮮血。這面國旗敘述在中國國民黨統治下，台灣鮮血橫流的情形。把黨旗加在國旗之上，把黨歌當作國歌，都可看出中國國民黨一黨專政，獨裁統治的跋扈心態。我在這兒向台灣人及中國國民黨呼籲，把這面殺害台灣人、侮辱台灣人的國旗換下來，改成一面有和平、有活力及有希望的新國旗。這個換旗的工作需要我們鋌而不捨地努力，盼望在不久的將來新的國旗在台灣飄揚。

一九四七年發生的二二八事件是無法變更的淒慘歷史。我們這一代卻負有不容第二個二二八事件再傷害台灣寶島的重大任務。我們知道一九八九年發生六四天安門事件，中國共產黨用坦克車及機關槍殺死好幾百位無辜的青年學生。萬一中國共產黨統治台灣，台灣人一定受不了壓迫而起來反抗。被中國人看不起的台灣人，一定會再遭到無情的鎮壓及屠殺。為了我們子孫的幸福，讓我們提起勇氣，堅強地站起來，為台灣的獨立建國共同努力！

特別寫了以下的一首詩來做一個總結。

『彼款國旗』

(台語吟讀)

青天白日見黨旗
滿地紅血個害死
為咱子孫就志氣
打拼建國出頭天